

世界文化論壇報

CULTURE COMMUNICATION

北美第一家華人文化報 在美華人的精神家園

2021年2月28日

第85期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1540-2339

主辦: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

協辦:美國過程研究中心

柯布院士新春致辭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我由衷地相信中國人民將會迎來平安喜樂的農曆春節。我誠摯祝賀勤勞、智慧的你們戰勝了新冠肺炎疫情，並在此天災大難中成功地實現了經濟正增長。正所謂“行高於人，眾必非之”，中國人民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引起了大洋彼岸一些美國領導人的嫉妒和對美國帝國正在崩潰的似是而非的恐懼。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不再仰望我們，中國的世紀就在前方。也許中國世紀可以成為全球實現生態文明的時代。

然則，生態文明任重道遠。也許在萬象更新的一年，中國會有新的突破。例如，我們了解到真正好的土壤可以吸收造成全球持續變暖的大部分碳。同時，好的土壤也意味著豐富的農作物和健康的食物。我堅信中國政府在幫助農民改造農藥殘留和貧瘠土地的過程中能復舊如初，再現華夏肥壤沃土。

也許，中國將引領世界飲食習慣革命。在二十世紀，數以億計的人成為“食肉動物”，肉類成為人們日常飲食的主要食材。全球肉類商品激增的後果是對牧場需求的增加，這是以砍伐森林為代價的。戲謔的是人類健康沒有因食肉而改善，反而全球變暖，肉類工業生產的“竭澤而漁”等後果接踵而至，將動物的生態大計小用，更甚，結果倒置，反噬生態。中國或許可以運用以小博大的美食生態智慧（用少量肉精加工），或者，引導消費者食用人們無法分辨的素食仿肉制品。這樣的話，中國的食品大計將更加多元。

或者中國可以發揮大國影響力，減少塑料的使用量。我們都知道這一善舉對海洋和生活在那裏的生物

意味著什麼。塑料已經成為我們生活方式的核心，我們很難想象沒有塑料的生活。但是回望幾千年來人類沒有塑料的生活史，當今是完全可以避免大量使用的。再次寄希望以中國，也許中國能夠引領世界進入後塑料文明。



我喜歡把中國人看作是篤誌而體的智者。中國已經在諸多方面領先於世界，新的一年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願你們再延輝煌。願你們以新的方式向生態文明邁進，祝你們在新的一年裏繁榮昌盛、幸福美滿，邁出新的步伐，為我們的星球療傷，造福人類共同福祉。

（譯者李棟，內蒙古師範大學博士）

本期要目

- ◆ 柯布院士新春致辭 (P1)
- ◆ 刘孝廷——“生态文明与第二次启蒙”国际高峰论坛致辞, (P3)
- ◆ 张磊 李栋——迈向新的可能 (P3)
- ◆ 贝克——第二次启蒙和全球知识对话 (P5)
- ◆ 黄毅——第二次启蒙与经济学范式变革 (P8)
- ◆ [意大利] 墨爱德——社会-生态转变的新范式及其指标 (P11)
- ◆ 李玲——詹克斯建设性后现代理论中的社会生态审美 (P12)
- ◆ 张修玉——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 (P14)
- ◆ 薛忠文——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建设性后现代审美微澜 (P15)

浙江（麗水）兩山學院執行院長劉克勤給柯布院士的賀信

尊敬的柯布院士：

喜聞您96歲華誕，首先祝您福如東海長流水，壽比南山不老松！

您是世界生態文明建設的模範生，是知行合一的兩山理念先行者。

感謝您一直以來對兩山學院的關心和支持。我們將追隨您，積極踐行兩山理念，做高水平生態文明和高質量綠色發展最美窗口的排頭兵。

自2019年3月兩山學院創立以來，我院發展迅速。近些年來，麗水在踐行兩山理念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績。因為麗水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的突出表現，還獲得了習近平主席的表揚。兩山學院的教師們近兩年著重研究兩山理論，並延伸到兩山實踐的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核算工作。我們相信，好的環境將帶來好的經濟發展。

兩次麗水會議有過愉快的回憶，獲益良多，特別是先生的高風亮節、和藹慈祥！期望第三次相逢，共同助力蓮都，為浙江高水平現代化建設，為美麗幸福和諧新時代貢獻力量！

不平凡的歲月，每個人都了不起！中國的新年即將來到，祝您吉祥如意！

您是大家學習的榜樣，再次為生態大咖柯老祈福！

劉克勤

2021年2月8日

中國貴州牛耕部落有牛哥楊正熙攜五千村民為柯老送上生日祝福

尊敬的柯老，您好！

我是您的學生——牛耕部落有牛哥楊正熙，因有您和王老師樊老師的鼎力支持，很榮幸2019年10月初我得以從中國最邊遠的山村去到韓國參加生態大會，會上聽聞您的故事，聽過您的演講，才知道世界上真的有“生態聖賢”在人間。

明天就是您96歲壽辰，值此生態人同賀之際，我謹代表中國牛耕部落，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賀：祝您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是否太晚”？我想確實有點晚了！如果三十年前，中國就重視生態文明建設，中國真的還能有很多美麗生態的土地和村莊。現在中國正在亡羊補牢，還不算太晚。

您最早提出“生態文明的希望在中國”，在中國走向生態文明建設新時代的重要關頭，您一次又一次站出來發聲，還鼓舞性指出“中國給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帶來希望之光”。我相信，因為中國有您這樣的“生態聖賢”的鼓舞，現在已經有很多人投身到生態文明建設事業中來了！我很自豪，我本人能帶領我的五千位鄉親，正在建設全民全域生態的“牛耕部落——洋洞有機小鎮”。

九十六年，您一生最大財富的無私奉獻品質，您為全球生態文明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您的事跡，您的人品、學養、才具、精神是我們永遠學習的榜樣！

今天全世界生態誌願者們恭賀您九十六華誕，衷心祝您生日快樂！

在此，還特別想邀請您和王老師樊老師下次回國撥冗前來參加我們村“千牛同耕”活動，指導我們為中國農村生態文明建設做出示範！

謝謝！

您的學生：楊正熙

攜中國貴州牛耕部落五千村民

2021年2月8日

“生態文明與第二次啟蒙”國際高峰論壇致辭

刘孝廷

各位好，很榮幸被指定在這麼重要的場合代表中國學者講幾句話！

首先，祝賀這次國際高峰論壇順利召開！祝賀柯布先生96華誕快樂！今天的場景讓我想起了2015年在克萊蒙召開的第10屆國際懷特海大會的盛況。

啟蒙是個無盡的話題。激進的後現代主義者出於反現代性的立場，一般直接否定啟蒙，而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則善於包容對立事物的雙方，所以能發揚啟蒙的積極意義，特別是把啟蒙看作人類自我提升的一種努力形式，為新人新文明的到來奔走吶喊，這樣就找到了啟蒙的普遍性和一般原理。

第二次啟蒙就是第一次啟蒙的升級版，是啟蒙自身的自我超越。這樣一種新啟蒙恰恰代表了人類理性的成熟。正因此，以這個話題來慶賀柯布先生96華誕，是非常適切的。按照中國的話說，柯布先生是當代全球大儒，德高望重、仁者長壽。其實，柯

布先生就是新啟蒙最傑出的代表。

怎樣評價柯布先生光輝燦爛的一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有人長壽但不智慧，有人智慧而不長壽；

有人成果豐碩但不實踐，有人實踐但缺乏理論高度；

有人名利加身但疏於德性，有人有德卻誌業平平；

有人心憂天下個人未必幸福，有人雖然幸福卻不顧天下……

而所有這一切對立，在柯布先生身上都消融了。從信仰角度看，信望愛在他這裏早已肉身化，他的一言一行無不體現出高遠的境界、偉大的情懷、無私的奉獻；從做人的角度看，儒家講的仁義禮智信和溫良恭儉讓，基督教講的愛人如己，已成其生命自身的內在準則；從文明對話的視角看，他是一位在不同文明之間穿針引線、推動文明互釋的人，是一位跨文明生存的“世界人”，

所以他是一個真正的人，一個充分實現自我的人，一個完美的人。他是在世思想家中我最佩服的人。

海德格爾曾經用時間來詮釋存在，馬克思也說“時間是人類發展的空間”，在此柯老的百歲高壽就是對時間最好的詮釋。他以自己漫長的生命奮鬥史，為人類文明開拓了巨大的思想、美德、實踐和希望的空間，他是無數人的生命的標桿，是文明危機的最後一位先知。

祝福柯老健康長壽，預祝第二次啟蒙和本次大會取得圓滿成功！

謝謝會議的籌辦單位和組織者，謝謝各位，謝謝樊美筠王治河夫婦！

2021年2月12日是中國的農曆春節，祝柯布先生和各位新春快樂、闔府安康！

（作者劉孝廷，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副理事長）

迈向新的可能

——“生态文明与第二次启蒙国际高峰论坛暨柯布院士96岁华诞庆祝会”综述

张磊 李栋

2021年2月9日上午9時，籌備已久，備受矚目的“生態文明與第二次啟蒙國際高峰論壇暨柯布院士96歲華誕慶祝會”如期召開。180余位來自中國、美國、俄羅斯、韓國、意大利和匈牙利等國從事過程哲學與生態文明研究與實踐的專家學者齊聚“雲端”，以線上會議的形式，聚焦“生態文明

與第二次啟蒙”主題，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給現有人類生存與發展模式帶來嚴峻挑戰的背景之下，圍繞“第二次啟蒙”的理論意涵及其應對因“第一次啟蒙”給當下人類社會所帶來的經濟、政治、社會、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挑戰而給予的啟示和對策等問題，開展了多維視角下

的全方位思想交流、觀點分享與學術探討，用過程哲學學者特有的“走進歷史，創造歷史”的時代擔當與濟世精神，為當前囂擾不安的世界，貢獻了邁向新的可能的冷靜思考與深邃見地。

2月9日系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懷特海再傳弟子，世界著名過程哲學家、生態經濟學家、建設性後現代主義領軍人物，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創會主任，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創院院長，西方社會綠色GDP的提出者之一，有著當代“生態聖賢”之譽的小約翰·柯布（John B.Cobb）博士96歲生日，本次會議可看作是對柯布博士的致意！與會學者，借由會議平臺，通過不同形式，紛紛向為過程哲學與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思想的研究、傳播與發展，為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及其中美人文交流做出卓越貢獻的柯布壽星致以真摯的生日問候與祝福。哈爾濱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的學子們用女生小合唱為柯老奉上了一首風格別致的“生日快樂歌”。來自雲南的白族姑娘胡蓉及其兩個可愛女兒則為柯老獻上了一曲曼妙的白族舞蹈，大家恭祝柯老身體健康，幸福吉祥。

會議由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項目主任、三生谷柯布生態書院院長樊美筠博士主持，美國威利姆特大學凱蘿·朗校長，中國綠發會周晉峰秘書長，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菲利普·克萊頓院長，柯布研究院約翰·福海院長，老土創始人羅易女士，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劉孝廷副理事長等中外學者作為會議嘉賓在開幕式上致辭。克萊頓院長在致辭中指出，“本次會議的目標是從新冠肺炎危機中汲取重要教訓，這將在我們尋求氣候危機解決方案時，為我們提供指導並增強我們的能力。”他認為，“因著建設性後現代和第二次啟蒙的理論儲備，中國學者對生態文明的理解遠遠深於其他國家的學者。”他希望，通過本次會議，在中西方學者共同的努力下，能產生出重要的新見解。

柯布院士為會議做了題為《生態文明與

第二次啟蒙》的主旨演講，對第二次啟蒙與生態文明的關係進行了獨具智慧的闡述。他認為，從一開始，“生態文明”就具有兩重含義。對於某些人來說，生態文明意味著與大多數文明不同，要更關注自然環境並努力保持環境健康。另一方面，生態文明也意味著對整個生命系統層面意義的追求，是一種“整體生態”觀，即把人類視為自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強調，我們所期望的生態文明與其他文明有顯著差異，這種與現代文明的差異非常重要。然而，生態文明依賴於現代文明，現代化發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實現生態文明。生態文明屬於一種後現代可能性，但並不唯一。現代性的極度腐化讓第二次啟蒙的來臨變得更加急迫。人類需要一個連貫的認識，要增加人類對彼此和整個世界的關心。這種認識要帶來新的價值觀，讓金錢主導讓位於對真理和幸福的追求。他最後強調，生態文明的建設需要觀念的變革和方法的變革，這離不開“第二次啟蒙”，在這一過程中，需要在分崩離析的現實世界中實現“用可持續發展的舉措來替代傷害人類和環境的做法”的共同體和“試圖用第二次啟蒙代替第一次啟蒙思想”共同體“兩個圈子”的融合，用整合性的思維促進整合性行為的產生與實現。

在隨後的大會發言中，美國拉文大學生物學教授傑伊·瓊斯，美國裏昂大學哲學助理教授約翰·貝克，匈牙利生態文明研究中心主任阿拉提·格蘭德皮埃爾，意大利學者，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全球化與發展項目主任、副教授墨愛德（Edoardo Monaco），韓國生態文明研究項目主任韓允禎，俄國學者達蕊婭·濟科維奇，中國中西語言哲學研究會會長、四川外國語大學資深教授、博導王寅，華東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導王峰，中國農業大學農學院教授、博導胡高躍，四川師範大學倫理研究所唐代興教授，哈爾濱師範大學教育科學院院長溫

恒福教授，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榮譽學院教授、生態文明拓展中心主任楊富斌，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治河博士，哈爾濱師範大學教育科學院博士生導師楊麗教授，深圳大學身體美學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王曉華，南方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人文科學中心教授田松，安徽大學經濟學院黃毅，中國綠發會生態社區基金主任吳道源，老土創始人羅易，中國綠發會自然教育學術委員會學術專家研究員何秀英等26位知名學者和生態文明踐行者分別以《科學的力量與生物多樣性的命運：呼喚第二次啟蒙》，《第二次啟蒙與文明的對話》，《第二次啟蒙呼喚一種綜合性的世界觀》，《生態轉變的三個層面》，《第二次啟蒙與體認語言學》，《第二次啟蒙與生態後人類》，《第二次啟蒙與全域有機農業》，《啟蒙·後現代·生境：第二次啟蒙的意義》，《第二次啟蒙與大學教育改革》，《建設性後現代視域中的生

態文明》，《第二次啟蒙與有機教育》，《第二次啟蒙與生態社區建設》，《第二次啟蒙與鄉村社區的繁榮》，《第二次啟蒙與有機語言學》為題，就二次啟蒙與生態文明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學術交流，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正如楊富斌教授在會議最後總結指出，這次會議是就第二次啟蒙與生態文明問題所召開的最高規格、主題鮮明、與會者暢所欲言，展現智慧觀點的成功的會議。此次會議的成功舉辦，在進一步增進國際學者在過程哲學、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生態文明、第二次啟蒙等方面的學術交流與共識形成的同時，也向後疫情時代的世界尋找新的變革可能貢獻了思想的力量，展現了過程哲學獨具的智慧光芒與歷史價值。

（作者張磊，管理學博士，雲南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講師。作者李棟，教育學博士，內蒙古師範大學教育學院講師）

第二次啟蒙和全球知識對話

【美】約翰·貝克博士 詹敬秋譯

本次演講的目的在於，將第二次啟蒙放置在同歐洲啟蒙運動和現代性興起的對話背景中加以談論。以上每一種哲學和科學運動都帶有一種充滿說服力的世界觀，並以一系列假設作為基礎。這些假設應對了一系列需要關注的情況。這些思想運動是自然而然的，使人聯想到黑格爾的歷史辯證運動。正如啟蒙運動興起於特定的環境之中，現代主義的新環境也迫切呼喚一套新的理論假設。第二次啟蒙的系列假設就是對於現在和未來的充滿希望的糾正。

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反思是

對王治河博士的英文文章《中國的第二次啟蒙》（《宇宙》，2007年秋冬刊）的進一步闡述。在這篇簡潔易懂的文章中，王博士認為，基於懷特海/過程思想原則的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可以克服現代化的陷阱，這一陷阱就是西方世界和全球現在所面臨的陷阱。更具體地說，他認為中國無需重蹈西方發展覆轍，中國有望通過全新的、更加全面的發展道路實現現代化。我完全同意他的論點。然而，我的目的不是重申他的主張，而是進一步展開有關理性和知識的現代和建設性後現

代假設之間的根本區別。我認為，人們對於構成理性的無形本質缺乏根本的認識。因此，人們需要將理性的權威加以語境性的和多元性的理解，拒斥啟蒙運動關於理性是一種客觀的、價值中立的探究方法的主張。

作為一種免責聲明，我意識到以上都是思想史上的偉大時代，並且這些時代之間存有許多細微差別。為簡潔起見，我將總體上通過這些術語所表現的一些核心特性來討論它們。本文有兩個相互關聯的目標：其一，探索科學

革命和啟蒙時代的知識分流。前者的成功在方法和目標上對後者產生了重大影響。然後我依托王博士有關啟蒙運動五個局限性來研究理性的作用，這也是他認為的啟蒙的局限性之一。在這裏，我將通過在全球範圍內展示了知識複雜性的後現代哲學來進一步闡明這一點。最後，我以對第二次啟蒙的承諾加以評論結束行文，我認為它是一場基於地方和集體目標，並促進共同利益的全球運動。

西方的現代革命

17世紀的科學革命和18世紀的啟蒙運動為理解世界、人類和文化开辟了新的、成功的路徑。你只需想想人們所長期持有的地心說信念，在其中人類將自身理解為宇宙的中心。而它後來被以太陽為中心的日心說的發現取而代之。這一發現震驚了西方世界，並對宗教界和知識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令人詫異的是，科學方法並沒有因人類的情緒傾向而發生動搖或改變。科學僅僅關心事實，而不會關心人類的恐懼、希望、欲求或渴望與訴求。這對於科學研究，特別是宇宙學事業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值得贊揚的參考點。然而，啟蒙時代錯誤地認為，科學所展示的客觀性應該平等地應用於知識的所有領域。

其一，科學探究的最終結果給當時的知識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在哲學話語的最初階段，揭示永恒的真理是一個核心目標，即描述現實的真實情況。脫離人類章程的純粹理性和科學，被提升為思想的黃金標準，從而迎來一個現代化的時代。科學探究的成功被延續並貫徹到哲學方法中，其中最著名的是勒內·笛卡爾。他提出了一種包含這種精神的哲學方法，旨在通過他的演繹法獲得無可置疑的確定性。儘管追求精確令人欽佩，但他雄心勃勃的方法論帶來了一個機械論的宇宙，將其有機本質簡化、劃分為一個精確的發條裝置。

這裏我再回到王博士的論文，他指出了啟蒙運動的五個相互關聯的局限性：對自然的帝國主義態度、對傳統和過去的虛無主義態度、對科學的崇拜、對理性的崇拜，以及對自由的單向度理解。這裏有兩點需要我注意：對理性的崇拜和對自然的帝國主義態度。如前所述，現代性受到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的影響，對世界及其多元文化持有某些總體假設：前者是機械的、靜態的、可估算價值的，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後者則僅憑其追求理性的能力而加以分類。如上所述，純粹理性被認為是

人類潛能的巔峰，它將帶來一個烏托邦的社會。西方世界獲得了物質財富，並尋求分享這種普遍適用的理解模式。西方對自然的統治演變為對非西方文化的統治——帝國主義。

西方帝國主義把這種喪失靈魂、缺乏背景的“理性”強加給世界，破壞了對話、發展和合作的獨特可能性。公平地說，西方文化的物質利益是混合的，但對本土的認識論和價值觀來說卻是毀滅性的。然而，這種優勢似乎只是自然和適當的，因為它被認為是人類潛能的發展頂峰。然而，這引出了一個問題：“什麼是理性？”它的意思存在一個單一模式嗎？還是說，理性是多樣化的？在此，我們有必要停下來反思理性的奇特定位，並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理性是由什麼構成的？”西方啟蒙運動的先驅者會驚嘆於其客觀的、不受情感因素和價值觀影響的方面。然而，正如後現代運動所恰當證明的那樣，純粹的客觀性是一個神話。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曾辛辣地提醒我們：“在科學思想中，最熱心主張客觀性的人都堅持客觀性的重要性。事實上，“堅持一種學說”本身就是一種堅持。除了興趣之外，你只會註意到這個學說而不會堅持它。

對真理的熱情是以利益為前提的。”（懷特海：《思維方式》，8-9頁）

理性不是一種普遍的方法論或概念，不受構成它的時空矩陣的約束。啟蒙運動在某些條件下興起，使我們的現代世界得以顯現，但它忽視了我們多樣化的理性模式。是的，在經濟“理性”中，獲得更多財富是一個“客觀”目標，但其代價是什麼？第二次啟蒙，如同第一次啟蒙一樣，是對一個新的背景，一個全球性的背景做出反應，因而需要一種新的理性模式：一種由文化協作、靈活性和適應性加以定義的理性。

第二次啟蒙

這種對啟蒙運動及其後果的粗略審視，很自然的表明，我們需要一種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第二次啟蒙拒絕了理性需要純粹的宇宙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假設。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但一種新的環境社會思潮已經出現，因而需要在生態、正義、代際、再生、經濟、地方、國家、全球等多種知識模式之間展開對話。理性呈現出一種非常不同的特征，它體現了協作、道德和相互關聯。第二次啟蒙邀請所有的“知識”聚集在一個開放的平臺上，以共同應對我們新的全球形勢。在對於理性的傳統理解方面，女權主義、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生態正義等的傑出貢獻值得我們學習。王博士把這稱為審美智慧，它意

味著知識在追求共同利益時的靈活適用性。

有些人可能會說，這只是相對真理。雖然它的確使真理變得更加複雜，但它也確實使真理變得毫無意義。第二次啟蒙認識到複雜性的觀點，以便提供一個更全面的圖景，引導參與的其他模式。例如，僅僅靠更多的科學發現並不能解決環境危機。此外，每一種文化或社區都面臨著獨特的問題，所以一刀切的知識無法解決人類的獨特特征。進步不是線性的，也不是以任何單一的文明來衡量的。國家和地方社區在尋求共同利益的過程中需要解決自身的特定目標。第二次啟蒙認識並欣賞這種變化，允許並鼓勵不同的表現方式。然而，矛盾的是，第二次啟蒙促進了更大的自治權，同時又提倡跨社會單位的更大協作。同樣，從共同利益的角度來看，這些差異是相輔相成的。

上述關於第二次啟蒙的評論克服了第一次啟蒙遺留下來的殖民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純粹理性主義，同時也重新校準了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人類對自然的統治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種征服的負面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人高於自然”的錯覺觀念忽視了宇宙是有機的、相互關聯的矩陣。自然界中不存

在等級制度，因為一切都是循環和相互滲透的。對自然的支配已經把人類帶到了一個生態臨界點。大自然也做出了同樣的反應：紊亂的天氣模式、不斷上升的海平面、酸化、被困的溫室氣體等等。這些科學事實都指向“人支配自然”的荒謬。於是，第二次啟蒙取代了古典認識論和本體論的等級制度。人類已經對地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大多數情況下，除了即時滿足和物質財富之外，沒有任何對地球的倫理考量。

總而言之，啟蒙的影響——殖民主義認識論的傳播及其相應的人與自然的構想——是第二次啟蒙要修正的中心問題。作為一種回應性和反思性的運動，第二次啟蒙和建設性的後現代主義更適合於處理環境變化的歷史，如環境危機。它對知識的合作呼籲不僅涉及地球生命的環境問題，也涉及生態正義，這是一個涵蓋社會正義、新殖民主義、奴隸制、知識帝國主義等諸多方面的廣闊概念。

（作者約翰·貝克（John Becker）

博士，美國裏昂大學哲學助理教授，此文系作者2月9日在“生態文明與第二次啟蒙國際高峰論壇暨柯布院士96誕辰慶祝會”上的發言。譯者詹敬秋，西交利物浦大學中國文化教學中心博士）

第二次啟蒙與經濟學範式變革

黃毅

各位線上的老師、同仁，大家下午好！

我是安徽大學經濟學院的一名教師，2015年受國家留學基金委資助來到美國拉文大學做訪問學者。偶然的機會，在隔壁小鎮克萊蒙幸遇柯布先生、樊美筠博士和王治河博士，並參加了當年在克萊蒙舉辦的生態文明千人大會。在那次會議上，我初步了解了過程哲學和建設性後現代主義，這些思想和我之前的尋求不謀而合，我由此步入了生態經濟學之路。回國後，治河老師和美筠老師創造了很多機會，我得以同柯布先生進行面對面的交談。柯布先生的思想和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了我，給了我很多啟發。今天是柯布先生96歲生日，非常榮幸有機會以這樣的方式向柯布先生表達我誠摯的祝福，同時將我這幾年在經濟學範式問題上的學習和探索做一簡短匯報。

過去的2020年是極為不平凡的一年。很多生命隕落，所有人的內心在這一年跌宕起伏。我想用兩個在2020年內嵌入我們生活的詞開啟接下來的話題。這兩個詞是“內卷”和“新冠”。

通常情況下，大家不會將這兩個主題放在一起思考它們的關聯，更不會將它們同經濟學和經濟學範式掛上鉤。但是稍作解釋，其中的邏輯關聯就浮現出來。

首先，按照深圳大學王曉華教授的定義，內卷（我們聽到最多的是996）是指人們在工作或考試中非理性的內部競爭、內部消耗和停滯不前。它源於市場競爭日益白熱化，人們不得不在相對封閉的系統中重復單一化和單向度的勞動和生活，無暇享受生命的豐度和廣度。大部分人在內卷中感受到生命被消耗，疲勞、缺乏創新，不得

不隨大流。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從2019年底至今一直延綿不斷，全球化更加劇了疫情擴散的速度。除了國際旅行，進口海鮮、進口車厘子都被檢測出病毒陽性。這些似乎在暗示人類，全球化市場的長鏈供應存在某種問題。在全球抗疫策略中，中國舉措是最為成功的。封城、隔離、網格化社區治理構成的短鏈供應迅速平衡了全球化規模經濟和過度專業化分工帶來的失控和失調。

但是，無論是內卷還是新冠疫情，它們給人類帶來的共同感受是：我們的生命和生命支持系統正在變得日漸脆弱。

從內卷到新冠，我們回溯到的兩個關鍵詞是競爭和全球化。正是工業文明及其思維方式下的經濟學範式，將這兩個概念在現實中發展到超越其邊界的極致，成為引導人類現代生活的“看不見的手”。

眾所周知，現代主流經濟學範式下學科研究的目標是物質和財富極大豐富以及個人效用最大化。資本對財富的追求帶來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專業分工的不斷加深。人類在短短幾百年的時間內的確實現了生產效率的極大提高、技術的突飛猛進。但這背後不斷湧現新的危機：人的異化、市場失靈導致的資源配置失靈、公共政策失效；壟斷和貧富差距加大；自然資源的枯竭和不斷發生的生態災害。技術派認為所有問題都可以通過人類日新月異的技術解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倒不認為技術可以通吃一切，他們也十分擔憂資本的異化。但是秉承馬克思的話：“新社會主義者’只有在物質極大豐富的客觀條件下才會出現，資產階級的自私只有在稀缺性本身消失時才會消失。”因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

們的主要工作依然是在“增長”目標內探尋市場效率和社會公平的均衡路徑。

其次，現代主流經濟學範式中最大的假設前提是“理性經濟人”假設。即人是趨利的，人的行動邏輯來自於個體利益的最大化。在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階段，這種假定促進人從集體的羈絆和依附關係中獨立出來，人的潛能得到發揮並得以配合工業化對生產效率的追求。但是，當“理性經濟人”被集體意識固化，人卻逐漸變成了“單向度的人”，在利益計算中合理化自己的行動邏輯。理性經濟人假設已經經由社會生活培育了我們的思維慣性，在生活和關係中不停地計算“投入與產出”，計算自己的付出有沒有回報。提防、猜忌、苛責和評判使我們成為一座座孤島。我們不難看到：“單向度的人”的心理是工業文明“匱乏”和“稀缺”的思維在人類意識中的投射。

第三，現代主流經濟學範式使用的工具和研究方法主要是數量模型以及建立在數量模型基礎之上的演繹分析法。這種排除複雜外生變量、以簡化和抽象方式出現的經濟學分析方法同樣是為增長和效率服務的。當它愈加同現實脫離，其根基也愈加搖搖欲墜。透過近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的研究內容可以看到，經濟學家們正在極力試圖從經濟學之外的思考中解釋現代主流經濟學框架中難以自治的各種悖論。這也被後現代思想家認為是範式正在轉換的信號。

那麼，人類為什麼會陷入現代主流經濟學範式的思維泥沼中而不能自拔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本主義為中心的增長崇拜將人類從農業文明時代依賴相對豐富的終極資源——太陽（農業文明時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同大自然保持相同的節律），轉變為工業文明依賴相對稀缺的終極資源——地球（土地、石化能源、森林、水等）。為了不斷增加物質財富，擴大生產，工業文明時代的人類一頭鑽

進了對效率的追求中。我們甚至可以透支變現未來的地球能源。在不斷的競爭加劇中，市場除了扮演資源配置的角色，也同樣扮演了制造“稀缺”的角色。資本和市場特別擅長制造“稀缺”，土地是稀缺的、工作崗位是稀缺的、教育資源是稀缺的。日益加劇的稀缺推動價格上漲和競爭加劇，社會焦慮瀰漫。人被迫卷入永無止息的競爭中，否則便難以生存下去。

人類中心主義的自大導致人變得愈加孤立。孤立於他人，孤立於自然。然而世界是相互聯系的，所有事物都是內在地相互關聯的。個體的人的生成關係和群體的世界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相互聯系，使得世界在空間上彼此關聯、在時間上相互關照，無論人的生命活動還是人與世界的關係都處於富有生機的有機體當中。孤立和隔絕必然同時生成匱乏和稀缺。現代性這種與生俱來的匱乏和稀缺心理必然使其自身陷於封閉的視閾下，前途迷茫。

假如我們重新思考：人類真的是地球的主宰嗎？人類的幸福僅僅依靠財富的增加嗎？人真的是“理性經濟人”嗎？我想，所有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那麼，倘若我們擴大視野，將人置於自然環境這個有機體中，經濟學的視角必然發生生態轉向。事實上，經濟活動並非在封閉自足的系統中發生，經濟系統是社會系統的一個部分，而社會系統是生態系統的一個部分，因此經濟系統只是生態系統的一個子系統。人需要被置於自然和整個生態系統的互動關係中，而非自然被置於人的利益之下；經濟需要被置於社會關係中，而非社會關係被置於經濟體系中。如果經濟學家割裂了經濟規律與產生它的現實之間的有機聯系，脫離了與整體和其他部分關係的規律去解釋變化了的現實或者指導實踐，就會對現實造成歪曲並導致嚴重的破壞性後果。

與生態轉向相適應的後現代經濟

學範式是對現代主流經濟學範式的深刻變革。

首先，後現代經濟學的目標是為了共同的福祉；經濟應當服務和增強共同體。後現代經濟學關注我們與他者的共生關係，他者的福祉同我們自身的福祉密切相關。在此基礎上，後現代經濟學不是極盡所能地攫取地球有限的資源創造財富，而是最大程度地尊重地球的有限性。地球至上主義而非人類中心主義將引導我們發展以地方市場為核心的、分散化的、基本自足的共同體經濟，這種經濟將以可再生資源為基礎，以直接滿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為目標；大眾廣泛參與決策的、對生態損害最小的可持續經濟。

其次，後現代經濟學範式的假設前提是：人是“共同體中的人”。“共同體中的人”同“理性經濟人”中的人以及集體主義下的人的本質區別就在於：共同體中的人的關係是內在的，而後兩種模式下的人的關係是外在的。“理性經濟人”的人之間是原子般的獨立個體，他們之間的連接主要通過市場交換來完成。競爭關係為主要關係。集體主義在西方以階級等級來確定人在社會中的角色，在中國則以傳統的倫理共同體出現。它們的共同特性是人在集體中的不平等性，人在集體中的差序格局下保持連接穩定的是外在強制力量。不論這種集體性在歷史進程中如何進化，由於低估個性而導致其喪失生命力。“共同體中的人”是共情的人。柯布博士認為：“人是由他們與其肉體和更廣泛的自然界、特別是和他人的內在關係構成的。除了這些關係以外，他們根本就不存在。他們是在人類共同體中形成和成長的，正是在共同體中並通過共同體，他們獲得了真正的個性和人格。”柯布將這種

關係的最佳模式表述為“共同體中的人”。“共同體中的人”的模型，關係的展開基於“互益及共同體的健康是第一位的，競爭是第二位的”。在這樣的集體意識排序下，關係的緊密依存在內外張力中保持和諧。

最後，後現代經濟學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在數量分析法之外加入更多案例法和歷史分析法。後現代經濟學認為數量指標、數量統計和數量模型是必要的但並不充分。將人納入自然、將經濟納入社會的經濟學必然將自然資源的成本核算納入計量分析中。除此之外，為了避免演繹法處理現實的局限，後現代經濟學使用更多的案例法對具體事件進行經驗分析；使用更多的歷史分析方法將時間跨度納入事件分析的整合之中。

因此，後現代經濟學關注的焦點問題一是如何實現公正的、參與式的、可持續的發展；二是經濟如何服務於建立網狀的生命支持系統，以恢復地球這個有機體的生機和活力。

與此同時，後現代經濟學強調新範式並不是要摧毀舊範式，也並非反對市場活動中的一切增長。它是對被納入更大背景下的經濟學所作的修正和重建。而後現代啟蒙（又稱第二次啟蒙）從強調有機聯系的過程哲學出發，通過範式變革，力求保存現代概念中的精華，克服其消極影響，對構建走向後現代化的經濟學起到有力的支撐作用。

經濟學在近幾百年的發展中成為顯學，它有義務在人類文明的轉向中直面自身的局限，勇敢地與時俱進，肩負開拓時代的使命。

（作者黃毅，安徽大學經濟學院講師。此文系作者2月9日在“生態文明與第二次啟蒙國際高峰論壇暨柯布院士96誕辰慶祝會”上的發言）

社會—生態轉變的新範式及其指標

[意大利] 墨愛德 (Edoardo Monaco) 朱子墨譯

大家好，我是墨愛德。我來自意大利。我在亞洲生活了16年，在中國待了10年，我現在是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的副教授和“全球化與發展項目”主任。該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的研究方向——發展管理和可持續性。

今天能夠與大家一起慶祝柯布教授的生日，我感到十分榮幸。柯布教授是我精神層面和學術層面的英雄，他確實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的思維方式，並且讓我重新看待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自從我從事博士研究以來，我的研究重點是不丹這個國家自身特殊的發展管理和可持續發展方法，即國民幸福總值。我認為，我們今天通過討論柯布教授多年的研究議題來慶祝柯布教授生日十分特別。

我必須說，柯布教授提出的許多議題在當今越來越具有現實意義，特別是在影響我們所有人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時期，這些議題變得更加深入人心。

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公共衛生危機，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環境危機。換句話說，由於先前存在的潛在重大環境危機，才導致發生今天公共衛生危機。

因此，從現在起對發展和進步的思考方式進行辯論尤為非常重要，它可能具有廣泛的蘊涵。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思維方式的革命，重新定義我們思考社會進步和發展的方式。

多年來，我們一直認為社會進步與市場產出最大化所取得的實

質性成就有很大關係，因為它可以用一種直接的方式進行相對地計算。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指標，以及我們認為能夠捕捉到所有發展動態的指標。我們使用GDP作為衡量社會自我轉型的一種方式。

但我們都知道GDP只是個虛假的偶像。

這是一種措施，但它使我們看不到許多其他方面，例如生態耗竭、生態退化、休閒活動和非正規經濟活動，而社會發展實際上是一個多維概念，不能歸結為某種東西，或者僅僅用支出來計算。我們需要接受思維方式的革命，以迎接多維且全面的新發展概念，也需要為實現這一更全面和多維的目標提供衡量成就的新方法。

為了實現思維方式的革命，轉變過往的範式，向新的觀念邁進，我們需要動員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包括政府領導、商業領袖和各級社會組織等。

如前所說，我們還需要一種新的衡量方法，例如國家政策、跨國議程（例如22030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等。而且，我們需要從人們所接受的教育進行變革。這實際上是一種文化上的努力，這種文化上的改變應該是先於經濟或政治上的改變。

如果我們回顧歷史，我們經常會看到某些成就或一些積極的變化常常是受到某一個特定歷史時刻的哲學運動的影響。因此，

我們可以看到哲學傳統和哲學運動在決定歷史社會進步方面的重要性。

因此，我認為柯布教授、王治河博士和樊美筠博士一起倡導的第二次啟蒙，確實是現代社會生態轉型真正需要的一種哲學基礎。它可以為生態文明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

就像我兩年前在中國參加的一次會議上柯布教授所說的那樣，生態文明也許是目前我們還未實現的願景。我們處於自然資源枯竭的歷史節點上。因此，生態文明既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也是一個非常艱巨的挑戰。因此，在通過經濟和政治手段實施之前，還需要強有力的哲學啟蒙。因此，在追求生態文明的理想之前，我們需要一種像第二次啟蒙這樣的哲學啟蒙。

我們現在處於十字路口，氣候變化已經喚醒許多人，但尚未動員數量足夠龐大的利益相關者去促進那種徹底的改變。新冠疫情是一場奪取數百萬生命的悲劇，但是如果我們能從這場悲劇中清醒過來，這或許是一次機會，可以讓人類看清楚自己的局限，認識到我們人類作為一個地球存在的物種的渺小，看清我們在宇宙中的角色並不是宇宙的霸主。新冠疫情提醒人們錯誤的觀點和錯誤的與自然的關係，看清人類不斷推進城鄉發展的邊界的錯誤行為，以及讓人們意識到什麼是道德的，什麼是不道德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場悲劇可以成為一個機會，我們真的

迫切需要推動一場生態變革。

我們需要動員更多的人們加入這場變革，來自頂部和底部的動員都是至關重要的。這需要廣泛的多維度的動員，需要我們有意識形態框架的支撐，這必須是有一個有效的、切實的參照，作為指引人類發展的參照。我相信第二次啟蒙和柯布教授多年的研究工作能為我們提供這樣一種意識形態上的

的需要。

所以，柯布教授，再次祝您生日快樂，感謝您為整個學術界和我們人類所做的傑出貢獻。作為一個人類的全球社區，我們面臨著一個充滿挑戰的未來，從某種意義上說，柯布教授的研究已經讓我們都有所準備去面臨這些挑戰。

再次感謝柯布教授，祝您生日快樂，一切安好！

(作者墨愛德 (Edoardo Monaco)，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副教授。此文系作者2月9日在“生態文明與第二次啟蒙國際高峰論壇暨柯布院士96誕辰慶祝會”上的發言。譯者朱子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本科生)

詹克斯建設性後現代理論中的社會生態審美

李玲

詹克斯 (Charles Alexander Jencks) 是當代建築界最為盛名的建設性後現代建築理論創始人之一。他擅長理論創作與實踐應用，把當代哲學社會科學最新理論、方法、理論與建築學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天才地結合起來，提出了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建築學新理論、新術語、新方法與新口號；他以對現代建築理論的局限反思批判為前提，以“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批判觀、自然觀、技術觀、消費觀等為指導，以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所倡導的生態、有機、過程、創新、多元理念為標準，廣泛綜合與辯證吸收當代建築領域各種先進理論並進行綜合性的揚棄和創新，最後提出了自己的生態建築美學理論。

在詹克斯宇建設性後現代建築理論中，提出建築新範式，並借用了大量現代復雜科學的語言，其核心概念是“突變”、“躍遷”、“混沌”、“自組織”和“自相似性”等。在一個激變的社會中，使人們對“復雜科學”不再陌生，“復雜科學”中的語言作為時代科學的符號，激發並影響著人們的思維，使建築不僅僅是具有空間意識，而成為人們認識世界的一個工具，並以各種形式詮釋著建築的生態審美。

“突變”是1972年法國數學家勒內·托姆

(René Thom) 在《結構穩定性和形態發生學》一書提出的。此書一問世，標誌著“突變”理論的誕生。在法文中，“突變”原意是“災變”，強調變化過程的間斷或突然轉換的意思，即某種自然現象或技術過程在發展過程中，從一個狀態跳躍式地變化到另一狀態，或經過一段時間緩慢的連續變化後，在某種外界條件下產生一種不連續的變化，即是突變現象。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活動中，存在著大量的突變和躍遷現象，巖石破裂、橋梁坍塌、海嘯、地震、生物變異、細胞分裂、人的休克、戰爭、經濟危機以及天氣突然變化產生暴風雨雪、氣體在溫度和壓力下變成液體等。托姆將這種系統內部的整體性突躍定義為“突變”。

社會現實中，大部分“突變”是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比如，城市、社區等作為一個有機體，其局部建設或發展會對整體肌理構成不同程度的影響，當城市發生“躍遷”變化時，不可避免地會破壞原有的平衡，面臨“突變”的威脅，使整個肌體系統嚴重失衡，因此如何把握有機體在動態發展過程中尋找新的平衡，就要研究從一種穩定組態躍遷到另一種穩定組態的現象和規律。無論是在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中，運動是永恆的，而這種“永恆”有穩定態和非穩定態的區別。在微

小或強大的必然、偶然擾動因素作用下，依然保持原狀態的我們稱之為“穩定態”，迅速離開原狀態的我們稱之為“非穩定態”，兩種狀態是相互交錯的。研究證明，非線性系統從某個平衡態（即穩定態）到另一個平衡態的轉化往往是以“突變”形式發生的，也就是說，某一個平衡態到另一個平衡態之間沒有任何可能的中間穩定狀態。

詹克斯通過模擬自然事物將自然事物的自相似結構轉變成建築形態的自相似性，所以他認為，當代的有機建築表現出來的即是自相似性，其共同特征是具有復雜的外觀和仿生形式。詹克斯對於非線性和突變概念對應的建築語言，其處理方法是一樣的。詹克斯認為，真正具有創造性的建築設計，不能消滅差異，因此既然承認建築歷史的發展是混沌和非線性的躍遷，突變現象在發生重大變革或時代轉化時屢有發生，甚至一個大型城市中，也會有相差懸殊的風格、類型的建築並存，也就完全可以認為是非線性、突變的表現。

在詹克斯的設計中，他用波形曲線和突然褶皺仿效復雜科學理論中的“突變”，跳出形象思維習慣了的建築形式，在建築規劃領域預示著突破性的潛在意義。詹克斯認為，宇宙中的有機體大部分是不可預見的，具有自我組織、自我創造性的，並且像蝴蝶一樣能夠自我蛻變的，各個有機體組成一個有活力的、不定的而不是靜止的、永恒的景觀，比如小山和水面組成的一個並置的、突然爆發和躍遷的、視角和主題差異的景觀。因此，詹克斯認為，最接近自然的設計的語言是由彎曲、疊合、無界構成的，同時景觀的波動和疊合也契合了中國古代堪輿、風水學中的“藏風聚氣”的說法，“突變”體現了能量的間歇性，並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辯證唯物主義觀點。

從詹克斯確定後現代建築語言的基本法則不難看出，他重視的是建築造型所表達的意義，因此他將一些生態建築、綠色建築的實驗作品也納入宇源建築學，其基本特征是具有相當復雜的外觀和表現形式，而這些表現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無序。“突變”打破了原有的秩序，造成了混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詹克斯從以下三個方面給出了解決方案。第一種方法是利用時間，時間的延續表達了新與舊的過渡和對

比，使無序走向有序。時間在消除混亂矛盾中，能扮演關鍵角色，將原本不協調的事物攙到一起，變成新的協調，所以要達到這一點，引進時間要素，通過多元化的語言建立鄉土主義和文脈來表現，實現建立在秩序基礎之上的混沌。第二種方法是將現有城市的結構與格局視為“底”，在這個“底”上，填加布置新的層次，形成相對和諧的“圖地”關係，並凸顯環境更新。第三種方法表現在詹克斯對邊緣位置的關注，他認為，表面的混亂可以依靠內在的組織深度，在邊緣位置達到平衡，這個邊緣位置最有創造活力，正如詹克斯所說的“具有自我、個性、自組織性的系統只存在於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縫隙——混沌的邊緣”。

詹克斯用“蝴蝶銳變”來闡釋宇宙中建築的“突變”，以“蝴蝶效應”類比建築“突變”後帶來的混亂。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量變是質變的準備，量變的臨界點就是質變的發生，在數學模型建構理論中，其表現形式便是“突變”。“蝴蝶效應”改變了人們對社會的傳統認識，即社會可以在一個穩定的環境中按照一個相對穩定的模式有序發展。由於對初始條件的高度敏感性，一點細微的變化都會引起社會的巨大震動。建築不僅僅是具有空間意義，而是一片關係場，是人與自然接觸的載體，而生態學運動則是這個載體的軌跡。這實際上是詹克斯後現代建築理論的一種隱喻，來揭示我們人類與自然的動態連續性。

現代社會是一個由人的因素、技術因素、環境因素和發展因素共同構成，多向、共時和互動的復雜系統，在每一個細節和每一個環節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蝴蝶效應”發生。詹克斯利用“混沌的邊緣”來創造建築的活力，依靠系統的組織深度、時間線和“圖地”關係，在邊緣位置使每一個細節達到平衡穩定狀態。詹克斯的建築“突變”理論蘊含著豐富的社會生態審美意識，凸顯了建築設計思維對社會生態的影響。在這樣一個復雜且充滿突變的時代，社會正被一些細小、看似不重要的事件所左右，而社會生態也需要構建有多種共生性的生存合力，形成無序、有序相協調的生態社會支持系統，以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和社會生態的和諧運行。

（作者李玲，山東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態保護修復

張修玉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提出，“我們要認識到，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樹。用途管制和生態修復必須遵循自然規律，對山水林田湖進行統一保護、統一修復是十分必要的。”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又著重指出：“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這裏要加一個‘沙’字。”近日的沙塵暴事件表明，“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態保護修復工作，要統籌兼顧、整體施策、多措並舉，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展生態文明建設”。為此筆者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強化系統思維，注重各種要素協同治理。要從生態系統整體性和流域系統性出發，追根溯源、系統治療，防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要找出問題根源，從源頭上系統開展生態環境修復和保護。要加強協同聯動，強化山水林田湖草沙各種生態要素的協同治理，推動上中下遊地區的互動協作，增強各項舉措的關聯性和耦合性。要註重整體推進，在重點突破的同時，防止畸重畸輕、單兵突進、顧此失彼。因此，要以“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為指導原則，按照生態系統的內在規律，統籌考慮自然生態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陸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遊，進行整體保護、系統修復、綜合治理，增強生態系統循環能力，維護生態平衡。強化流域綜合治理工作，把治沙與治山、治林、治田、治湖有機結合起來，通過對自然生態進行系統的保護、治理和修復，不斷增強生命共同體的活力，切實保障區域高質量發展。

二是加強本底調查，摸清自然生態環境概況。本底調查範圍應針對區域（或流域）、生態系統等不同尺度、不同梯度進行，深度應不低於同類工程的有關要求，制作基礎調查圖表數據應符合自然資源及相關專項、專業調查要求。區域（或流域）尺度上需關注生態空間格局，明確組成生態系統的類型、數目及分布；生態系統尺度，需關注構成生態系統的群落特征，明確動植物組成、生境質量、關鍵物種分布等。若工程區涉及保護區，還應明確保護區範圍及對象。除自然生態系統狀況之外，還應調查生態系統受威脅情況，識別主要脅迫因子，尤其是汙染、采礦、放牧、農業或城鎮開發、外來物種入侵等與人類活動相關的脅迫因子的強度及分布。

三是遵循自然規律，因地制宜開展保護修復。針對各類型生態保護修復單元分別采取保護保育、自然恢復、輔助再生或生態重建為主的保護修復技術模式。對於代表性自然生態系統和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及其棲息地，采取建立自然保護區地、去除脅迫因素、建設生態廊道等保護保育措施，保護生態系統完整性，提高生態系統質量，保護生物多樣性；對於輕度受損、恢復力強的生態系統，主要采取消除脅迫因子的管理措施，進行自然恢復；對於中度受損的生態系統，結合自然恢復，在消除脅迫因子的基礎上，采取改善物理環境，移除導致生態系統退化的物種等中小強度的人工輔助措施，引導和促進生態系統逐步恢復；對於嚴重受損的生態系統，應在消除脅迫因子的基礎上，圍繞地貌重塑、生境重構、恢復植被和動物區系、生物多樣性重組等方面開展生態重建。

四是開展監測評估，探索建立長效機制

體制。對生態保護修復區域採用遙感、自動監測、實地調查、公眾訪談等方式，開展生態保護修復工程全過程動態監測和生態風險評估。在結果和風險可控原則下，借鑒已有經驗做法，對可能導致偏離生態保護修復目標或者對生態系統造成新的破壞的保護修復措施和技術、子項目的空間布局和時序安排等按規定程序報批後進行相應調整修正。對技術成熟、風險可控、

結果有效的工程和措施，要及時實施，避免延誤時機、增加修復成本；對評估後難以預測後效的工程和措施，要及時調整。同時，要建立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態保護修復相關管理部門的協調機制和統一監管機制，建立“源頭預防、過程控制、損害賠償和責任追究”一體化生態保護修復機制。

（作者張修玉，廣東省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建設性後現代審美微瀾

薛忠文

現代派文學是19世紀80年代出現，20世紀20年代至70年代在歐美流行、繁榮並遍及全球的眾多文學流派的總稱。經過眾多天才作家的錘煉，它形成了表現主義、意識流小說、荒誕派戲劇、魔幻現實主義等流派。題材上，現代派文學注重挖掘作者自己的內心世界，實行了文學筆觸的大轉移，把社會之惡和人性之惡作為藝術審美的對象來描寫；藝術上，現代派廣泛運用暗示、象征、烘托、對比、意象、渲染和聯想等手法，以發掘人物內心的奧秘。

後現代主義文學是對現代主義文學的繼承、超越和悖離，非理性主義是他們的共同基礎，表現出激烈的反傳統傾向。現代主義文學摒棄傳統文學以“反映論”為中心的創作原則，建立起以“表現論”為中心的新規則。後現代主義否定作品的整體性、確定性、規範性和目的性，主張無限制的開放性、多樣性和相對性，反對任何規範、模式、中心等等對文學創作的制約。在後現代主義文學中，藝術審美範圍被無限擴大，任何形式的審美在文學藝術的神聖殿堂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經過長時間的發展，現代派文學藝術不可避免地走到了自己的盡頭：“從美學上看，現代藝術的衰落，源於它的兩大內在缺陷，一是對於美和自然美的放逐，二是對‘為藝術而藝術’的膜拜”。（樊美筠博士語）

改革開放，西風東漸。現代派，後現代派流韻被澤一些中國有開放意識的作家，他們耳目一新的創作極大地沖擊了當時的文壇。

茹誌鵬1979年發表了《剪輯錯了的故事》。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芮德菲爾德在其代表作《農民社會與文化》中首次提出了“大、小傳統”的概念，在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等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芮德菲爾德認為，“在某一種文明裏面，總會存在著兩個傳統：其一是為數很少的一些善於思考的人創造出來的一種大傳統，其二是由為數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會思考的人們創造出來的一種小傳統。大傳統是學堂或廟堂之內培養出來的，而小傳統則是自發地萌發出來的，然後它就在它誕生的那些鄉村社區無

知群眾的生活裏摸爬滾打掙紮著持續下去。”茹誌鵬的《剪輯錯了的故事》，正是通過革命幹部老甘與農民共產黨員老壽兩個人物之間不同時期的矛盾為主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大傳統”與“小傳統”之間這種複雜的互動關係。

《剪輯錯了的故事》描寫了革命戰爭年代曾經同人民群眾骨肉相連、患難與共的好幹部老甘，是怎樣在“大躍進”中變成不顧群眾死活，“變著法兒讓領導聽著開心、看著高興”的“甘書記”的，表達了在歷史長河中人性的異化；農民共產黨員老壽怎樣從革命戰爭年代的無條件奉獻到“大躍進”年代的懷疑、迷惘。由於故事的時間跨度大，在短短的篇幅裏表達盡可能多的思想內容實屬不易。作家吸取了一些西方藝術表現手法，採用時空切割、幻覺夢境、場景切換、情節跳躍；以段落為界限，時間相對照，人物心理描寫為手段，兩種不同形象交叉出現，使小說的容量和表現力大大增強。

劉索拉發表於1985年的處女作《你別無選擇》以某音樂學院為背景，塑造了一群

不可思議的荒誕人物形象。李鳴，頗有才氣，可他每天從早到晚想的都是怎樣退學。退學不成，便整日躺在床上睡覺。馬力，身為音樂學院作曲系學生，卻整天像圖書管理員一樣買書、理書，最後竟不明不白地死去。李鳴的睡和馬力的死，都令人費解，毫無價值可言。孟野，高材生，充滿創造靈感，離不開女人又被女人折騰。他的參賽作品，精妙無比人人叫絕，卻因有“法西斯”之嫌而被淘汰。妻子的一封控告信就斷送了他的星途。森森是個幸運者。他長期不理發不洗澡，只管砸琴鍵，立誌要砸出“媽的力度”和“自己的風格”，作品卻在國際比賽中獲獎。但這個獲獎也匪夷所思，因為孟野的作品無疑比他的更好。孟野作品的被淘汰與森森作品的獲獎就有了同一意味的荒誕。反對創新、刻板教條、墨守陳規，教作曲自己不會作曲的賈教授；兼有才氣和名氣，懶洋洋無動於衷、與世無爭的金教授，同樣給人一種荒誕感。學校的種種課程，考試、校規、風紀，更是給人不可理喻的荒誕感。小說表面似乎沒有什麼

明確的思想意義，但其中的意蘊卻是令人深思的。似乎沒有理性意義的探討，隨意勾勒的荒誕現實中的荒誕人物與荒誕事件，誇張、幽默、嘲弄、無理性的荒誕語言，“黑色幽默”的筆法使小說一經發表便引發爭議。有人認為該小說借鑒了美國現代派小說《二十二條軍規》中的“黑色幽默”的敘述方法，是我國小說界一反傳統敘述方式而採用現代派表現手法的一個嘗試和標誌。有人認為作者是用音樂結構來寫小說。也有人認為小說表現了“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的荒誕的思想情緒。客觀上看，小說反映了中國特定年代的特定現實，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情緒與騷動，也反映了一批執著追求、富有創造性的青年與特定社會陳規陋習之間的抵觸。正如王蒙所說：“劉索拉的小說在1985年出現是一個先鋒性的，並非偶然的現象。它的內容與形式都具有一種不滿足的勇敢探索的深長意味。”2018年9月，《你別無選擇》入選改革開放四十年最具影響力小說，充分說明了新創作手法對文壇的影響。另外，馬原、余華、

格非、殘雪甚至王蒙、莫言都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現實主義，而是大量借鑒現代派、後現代派的表現手法了。

這種別致的後現代表現手法，以建設性和創新為基調，強調美和自然美，贊揚美的社會價值，註重培養主體的生態意識和責任，以重建人與自然的親和關係為目標，這本質上是一種建設性後現代審美藝術。正如樊美筠博士在《建設性後現代美學藝術的新取向》中指出：“時代呼喚一種新的藝術，一種能夠與生態文明相匹配，能夠為生態文明鼓與呼的藝術。當代西方日益興起的建設性後現代藝術，特別是她對美和生態美的呼喚，對意義和歸屬感的追求，對藝術家社會——生態責任的擔荷意識的強調以及對重建人與自然親合關係的不懈努力在某種意義上昭示著美學和藝術發展的新方向，對於我們建設與生態文明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藝術不乏借鑒意義。”建設性後現代審美已然形成，文壇不溫不火也已多年，但一想起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現代、後現代沖擊波還是令人激動。

（作者薛忠文，山東社會科學院文化所副研究員）



《世界文化論壇報》

主編

樊美筠

編委

王治河

朱易

謝文鬱

黃勇

馮毅

曾慶華

倪培民

王蓉蓉

顧問

葉朗

樂黛雲

周桂鈿

安樂哲

學術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丁子江

丁宏偉

王寅

任平

劉孝廷

成長春

劉全華

劉笑敢

李晨陽

曲躍厚

陳俊偉

李惠斌

林克勤

吳國盛

楊富斌

陳榮灼

歐陽康

金惠敏

張修玉

俞懿嫻

顧林玉

魯樞元

鞠實兒

溫恒福

本期責任編輯

許迎輝